



第一章

中国政治与中国建筑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中，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建筑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政治意义。大的方面如城市规划、皇宫布局中体现的皇权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城市的管理制度和建筑中的等级礼制等；小的方面如工程营造的法式、规范，以及对平民百姓的伦理道德教育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建筑来表现。

一、营造法与建筑学——中国和西方建筑观的差异

“建筑学”一词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只有营造法。这两者的区别绝不只是字面意思上的不同，而是有本质意义上的差异。首先，从概念上来看，建筑学是从工程技术和艺术、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怎样把建筑做好；营造法则是一种法规和规范来告诫人们怎样做建筑，怎样使建筑符合统一的规定。其次，从基本性质上来看，建筑学是一种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本身并不含有政治性，它是科学性的、学术性的；而营造法作为政府的法规，是由朝廷颁布强制推行的，它是政治性的、制度性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关于建筑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程做法则例》，本质上就不是建筑学的专著，而是朝廷颁布的关于建筑的规范和制度，类似于今天政府颁布的建筑规范和建筑法规。在中国古代的书籍分类中，《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也不是被归为工程技术或者经济类，而是和礼制、法典、律令等一起被归为“政书”类。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了营造法的政治性因素。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师，只有工匠，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建筑师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并不亲自动手建造房屋，而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建筑设计，最后由工匠来实现其设计意图。工匠属于劳动阶层，他们并不懂理论，一般也不会做正规的设计，他们不知道什么风格、流派、思潮，也不懂得什么形式美的规律。但他们有实践经验，常在细微之处有巧妙的构思。当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匠，既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又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上升到了设计师的水平。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也是常有的，例如清朝皇家匠师“样式雷”家族，就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古代，甚至于到了现在，一般官员和老百姓都没有把建筑当作艺术，而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工程技术——“盖房子”。中国人一方面把建筑看作是一种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把建筑当作人身份地位的代表，平民百姓以建筑来体现财富，统治者则以建筑来表达权力和威仪。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艺术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方面——用宏大的体量和豪华的装饰来彰显社会身份。而西方则不同，人们自古希腊时代起就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属于美术的一类。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这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观念，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大学的建筑学科还是设在美术学院里面的。英文中的 **architecture**（建筑、建筑学）与 **building**（建造、建构、楼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architecture** 是有艺术性、文化性的，而 **building** 只是功能性地盖房子。西方人理解的建筑是前者，中国人理解的建筑是后者。所以西方在古代就有了建筑学，有了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设计师——建筑师。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就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写的《建筑十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专著。由于观念的不同，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的建筑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没有一个叫作建筑师的知识阶层来专门研究建筑，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重视建筑，相反，中国人还是非常重视建筑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重视。中国人虽然不注重建筑的艺术性，但是非常注重建筑的政治性。古代各朝代在兴建重要建筑，特别是与政治相关的国家重要建筑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很多懂得礼仪制度的礼官、史官、史学家和经学家来研究和考证过去这类建筑是什么样的形制。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要规划建设都城和皇宫，首先就是考证历代关于都城和皇宫的制度和做法。这说明统治者在建造这种重要建筑的时候很看重它的政治含义，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建造。

中国古代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建造类的书籍、专著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建筑制度、规范、法规等，是由政府颁布强制执行的，主要就是《考工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三部；另一类是民间工匠的技术经验的总结，像《木经》《鲁班经》等。显然，后一类不能算是建筑学的专著，它们只是一种技术书籍。而前者（《考工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实际上也不是建筑学的专著，而是一种“官书”或“政书”。所谓“官书”或“政书”，是由朝廷颁布、下面必须遵照执行的规范，即我们今天的建筑法规。例如《考工记》就是一本“官书”，

它的全名叫《周礼·冬官·考工记》，是一部关于工程技术方面的规范、制度类的书籍。《考工记》最初只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官书，并不是《周礼》中的。《周礼》中有“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别掌管国家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天官”负责朝廷内部事务，而“冬官”则主管工程营造方面的事务。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战乱，到汉朝再重新整理《周礼》的时候，“冬官”部分已经散失，《周礼》因而不全了，于是将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关于工程技术的官书《考工记》补入《周礼》，因此便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

宋朝的《营造法式》不仅是一部官书，而且其产生的过程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北宋中期，官场腐败、贪污成风，朝廷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园林、庙宇建造精美豪华，铺张浪费，主管工程的官员贪污严重。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节省财用、杜绝贪污。王安石请将作监李诫主持编修一部建筑工程的技术规范，规定了建筑的等级式样、用材规格、施工过程等相关技术规则，其中，尤以“工限”和“料例”部分最有特色。“工限”和“料例”实际上就是建筑用工和用料的计算方式。建筑设计和施工以“材”为模数，建筑上的所有构件尺度都以“材”为模数来进行计算，例如柱子的高度是多少个“材”，柱子的直径是多少个“材”等。“材分八等”，根据建筑的等级来决定“材”的等级，确定了“材”的等级，也就确定了建筑上各种构件的尺度，也就知道了这座建筑需要用多少工、多少料，这样就算是想贪污也不容易了。实际上《营造法式》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建筑学本身的意义。后来清朝又颁布了一部《工程做法则例》，是仿照宋朝《营造法式》的形式编撰的，其内容、作用、意义都类似于《营造法式》，只是建筑的式样、构件的名称、尺度模数的算法不同而已，又是政治意义大于建筑学本身的意义。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对于建筑是非常重视的，但这种重视不是从科学的建筑学或者建筑艺术的角度来重视，而是政治上的重视。

二、皇权思想与城市规划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政治因素所占比重之大，是全世界古代各国家、各民族中少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种现实理性型的社会形态，

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宗教型社会形态不同。例如西方古代长期受宗教文化影响，宗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教权高于皇权，文化艺术甚至科学技术都必须服从于宗教。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历来是宗教建筑高于一切，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到中世纪的教堂，欧洲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宗教建筑。世俗权力服从于宗教权力，皇权服从于教权。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皇权和世俗权力才得以加强。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夏宫、卢浮宫、凡尔赛宫等一批皇宫建筑出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座特别著名的皇宫，最宏伟的建筑都是宗教建筑，如神庙和教堂。

在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在世俗社会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任何朝代都是政治权力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过宗教权力高于皇权的情况，因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最宏伟的建筑一定是皇宫，如秦朝阿房宫，汉朝未央宫、长乐宫，唐朝太极宫、大明宫以及明清紫禁城，等等。它们中的多数已经烟消云散，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但时至今日却仍然不断地出现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中国历史上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虽然数量多，保存下来的也不少，但其规模、名声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都远不能与宫殿建筑相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皇宫就代表着那个时代，阿房宫就代表秦朝，大明宫就代表唐朝，北京紫禁城就代表明朝和清朝。而在欧洲，却是以宗教建筑作为代表，如帕提农神庙就代表着古希腊，巴黎圣母院就代表着法国的中世纪，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就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等等。中国古代的都城一定是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也以官府衙署为中心，西方古代的城市则一定是以大教堂为中心（图 1-2-1、图 1-2-2）的。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政治和宗教的不同关系在两部不同的文明史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首先表现在城市和皇宫的规划方面。古代城市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城市，这类城市一般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例如河流、道路经过的地方），由于商业集市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另一类是由人工规划建成，这类城市一般是都城或其他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都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改换地方，重新建都，于是就要重新选址，重新规划。例如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都曾是多个朝代建都的地方，然而每一次建都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往往是异地重建。例如长安（西安），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和今天的西安

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上（图 1-2-3）。又如北京，元朝建都于北京，称为“大都”。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元大都被废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重建北京城，城址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向南移。虽然很大一部分与元大都重合，核心的皇宫位置也与元大都皇宫重合，但是毕竟元大都已毁，明朝北京城等于是完全重建。清朝入关倒是没有破坏明朝的北京城和皇宫，基本上是全盘接收，适当加以改造、修复、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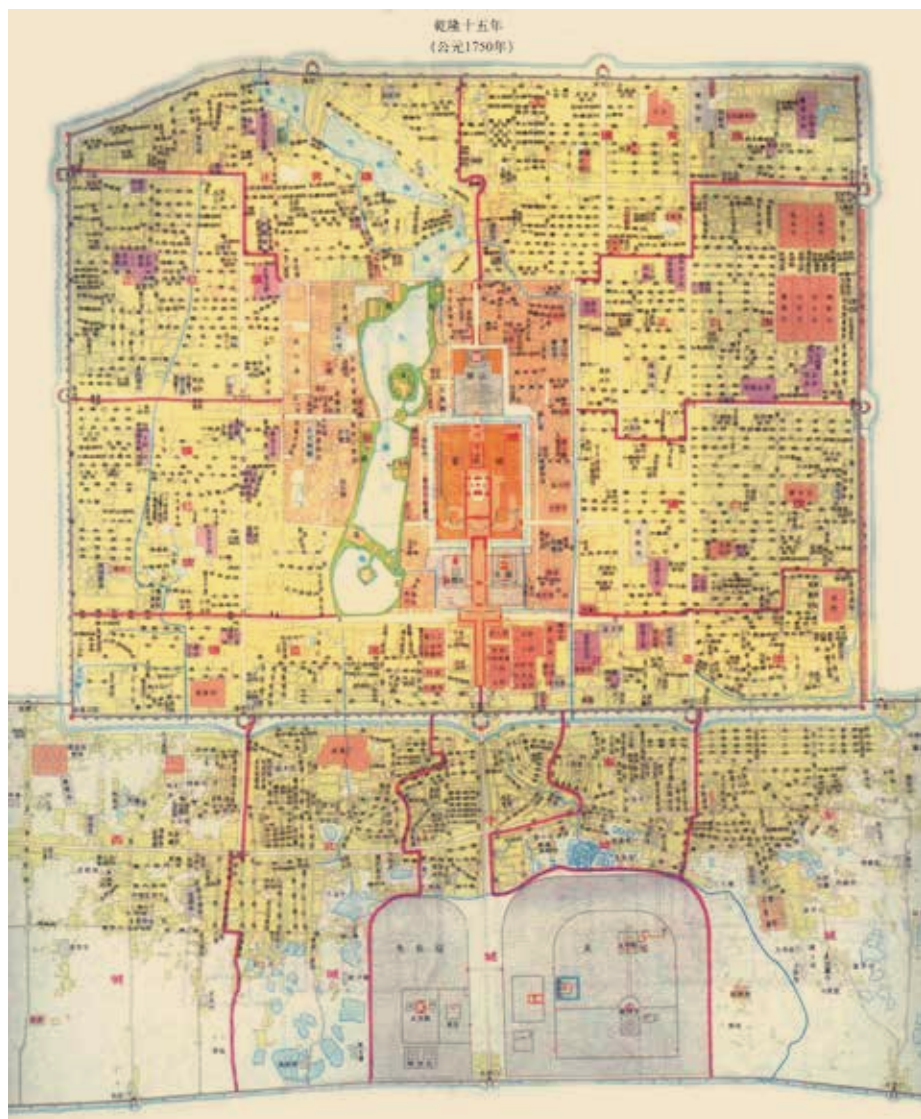


图 1-2-1 中国城市以宫殿、衙署为中心（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图 1-2-2 西方城市以教堂为中心（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中央最高的建筑是佛罗伦萨大教堂）



图 1-2-3 陕西西安城址变迁

因此，中国古代的都城总是在不断地重新规划、重新建造。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皇宫又是国家最高权力所在，所以都城和皇宫的规划首先要体现的就是政治因素。中国古代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宫殿的建造，历来都非常重视，希望以此来表达政治权力和社会的理想，每一次规划都要组织朝廷史官及文人学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尤其是在皇宫建筑的规划设计时特别注重考证。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记录朝廷事务的《会典》《会要》之类的典籍中，关于都城皇宫的规划过程及其历史考证的记载都很详细，因为这些虽然看起来是建设工程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中轴线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之所以首先考虑中轴线，是因为皇宫总是处在主轴线上。不论是在中国古代最早论述城市规划制度的《考工记》中，还是在历朝历代实实在在的城市规划中，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基本的原则。确定了主轴线也就确定了皇宫的基本位置，虽然在不同的朝代，皇宫在轴线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皇宫总是处在中轴线上。例如唐长安皇宫处在中轴线北端（图 1-2-4），元大都（北京）皇宫在中轴线南端，明清北京皇宫处在中轴线中央。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布局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宫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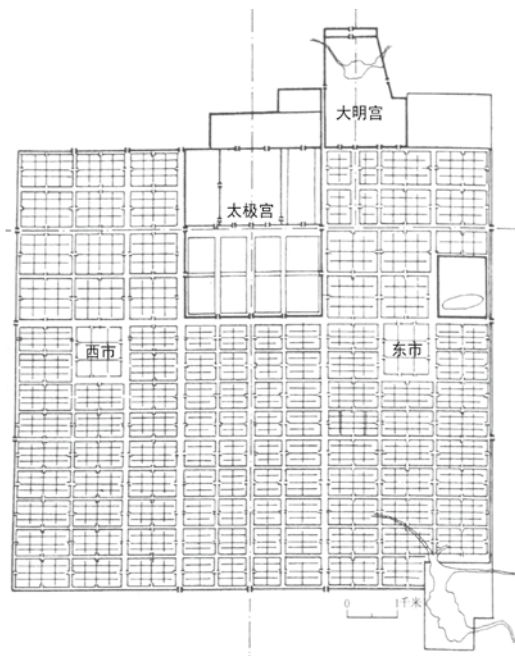


图 1-2-4 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唐长安城平面图）

禁城处在中轴线的中段，皇宫的大门是午门，午门南面是端门，端门南面是天安门，天安门南面是大前门（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改称中华门），大前门南面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一直往南，直到最南端，便是北京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回过头往北，从紫禁城出北门神武门，正北边是景山，景山山顶正中有一座知春亭，穿过景山知春亭再往北，中轴线上有钟楼、鼓楼和鼓楼大街。从南到北一条笔直的中轴线纵贯北京城，皇宫处在中轴线的中段，而皇宫的中心又是皇帝上朝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另外，都城南边有天坛，北边有地坛，东边有日坛，西边有月坛，四方拱卫，天下以皇帝为中心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明确（图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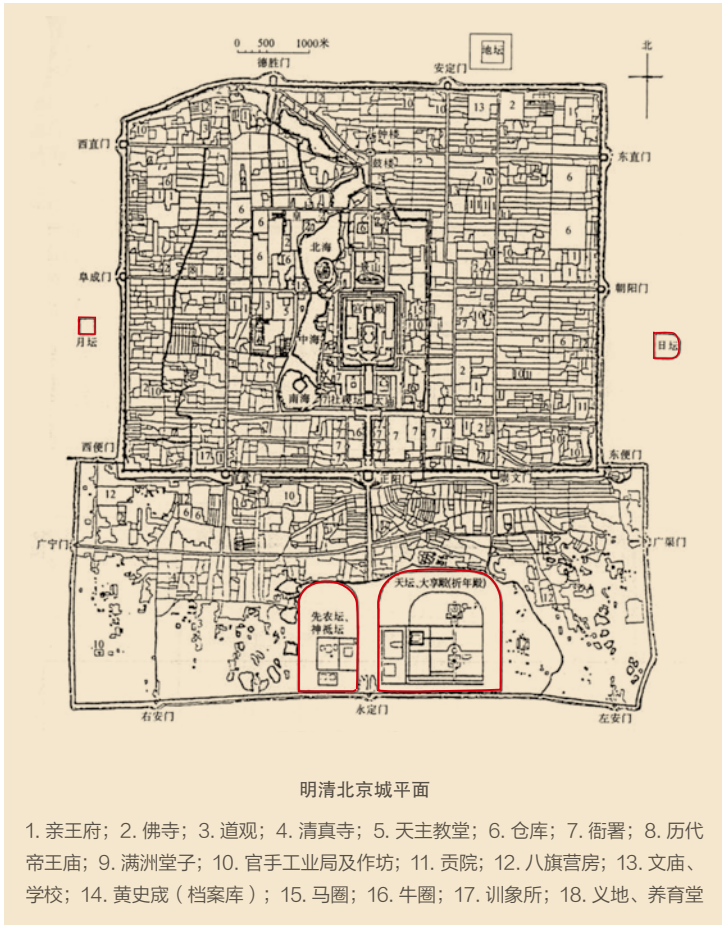


图 1-2-5 北京四坛

都城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则一般以衙署为中心。翻开各地的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地方城市虽然没有都城那样完整的规划，没有那样规整的中轴线，但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衙署（府衙、州衙、县衙）处在城市中心位置，这一点也足以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政治性因素。

不仅城市的规划有着明确政治性的规划制度，皇宫的规划更是有着详细的定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祖右社”等规定。所谓“前朝后寝”，是指皇宫分为前、后两个区域。前面的区域被称为“朝”，是皇帝朝会群臣处理政务的场所；后面的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后宫”，被称为“寝”，是皇室及宫女、太监等宫中人员居住生活的场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生活区”。这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一般情况下皇后是不能去前朝的。所谓“垂帘听政”，体现的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女性是不能去前朝的，要去也得象征性地挂一道帘幕，表示没有直接到前面去。今天北京故宫紫禁城就是以乾清门为界线，拉开一条长长的隔墙，把整个紫禁城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即“前朝”和“后寝”（图 1-2-6）。



图 1-2-6 “前朝后寝”（北京紫禁城乾清门）

辛亥革命成功后，当时革命党和清皇室达成协议，皇帝主动退位，革命党优待皇室。优待的政策是允许退位的皇帝溥仪和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继续住在紫禁城内，但是规定他们只准在后宫中活动，不准越过乾清门。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象征，只在后宫活动，不越过乾清门进入前朝部分，就等于只是生活，没有政治了，由此可见建筑的政治性意义。

所谓“五门三朝”，是古代宫殿制度规定皇宫前面要有连续五座门。《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即五座门分别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而皇帝的朝堂要有三座，分别为外朝、治朝、燕朝。在今天北京故宫中相应的“五门”就是大清门（明朝叫大明门，民国改称中华门，1976年拆毁）、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朝”即故宫中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图 1-2-7）。这三座殿堂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太和殿相当于“外朝”，是皇帝朝会文武百官和举行重大典礼仪式的场所；中和殿相当于“治朝”，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之前临时休息的地方，有时也在这里处理一般朝政，每届科举考试中最后皇帝亲自主考、钦点



图 1-2-7 故宫三大殿中的中和殿、保和殿

状元的殿试也是在这里举行；保和殿相当于“燕朝”，是皇帝个别会见朝臣、处理日常朝政的场所，点状元的殿试有时也在保和殿里举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和殿，它是皇宫中最重要的殿堂，皇帝的登基大典必须在这里举行，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图 1-2-8）。

所谓“左祖右社”，是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祀祖宗的祖庙，右边是祭祀社稷的社稷坛。中国人是一个重视祖先的民族，祭祖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历史传统，皇帝也不例外，而且要做全国人民的表率，要把祭祖宗的祖庙建在皇宫旁边最重要的地方。《礼记》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礼记·曲礼下》）。祭祖宗的地方比居住的地方更重要。祭社稷也是如此，“社”是指社神——土地之神，“稷”是指稷神——五谷之神。中国古代是农业国，皇帝必须隆重地祭祀社神和稷神，“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仪》）。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正式确定了王宫规划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制度。在今天北京故宫的布局中我们还能完整地看到“左祖右社”的痕迹——天安门的东边是太庙（皇帝的祖庙叫“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的西边是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图 1-2-9）。需要注意的是，这里



图 1-2-8 故宫太和殿中的皇帝宝座

说的“左右”，是按照皇帝坐在皇
宫中坐北朝南的方位，即他的左右。
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外，面朝皇宫里
的时候，左右就正好反过来了。中
国古建筑所说的“左右”都是这样
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
中国古代建筑中，或在人们的座位次
序排列中，左右关系是有着等级地
位的差别的。

“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
祖右社”等一系列关于皇宫规划的
制度，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皇权意识，
用建筑来表达社会政治观念。

不仅城市规划突出政治的因
素，就连建筑群的布局规划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古代建筑的一个区
别，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西方古代建筑重单体，重立面；中国古代建筑重
群体、重平面。西方古代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不论是神庙、教堂、宫殿，
还是其他公共建筑，都是一栋一栋独立的。中国古代建筑则基本上都是群体组
合，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庭院，几栋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
若干个庭院组成一个建筑群。在中国的古建筑中，除了一些风景名胜和园林等
地方有一些孤立的亭台楼阁作为风景点缀以外，其他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一栋是
独立的。宫殿、寺庙、园林、祠堂、书院、会馆，直到人们居住的民居、住宅，
都是庭院组合的建筑群。西方建筑注重的是单体建筑的立面造型，柱子、墙面、
屋顶的雕刻装饰等，强调的是个性；中国建筑注重的是平面布局 and 建筑群体的
组合，立面造型则没有很多特色，强调的是共性（社会性）。在庭院布局 and 建
筑群的组合方面，中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庙宇前的大庭院，宽阔的大空
间，庄严宏大的仪式场面；住宅书楼内的小庭院，狭窄的小空间，静谧安宁的
个人天地。按照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精神需要来组合建筑、布置庭院，这是中
国建筑最精彩、最具魅力的特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庭院就代表中国建筑。



图 1-2-9 北京故宫“左祖右社”的布局

中国的庭院和建筑群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使用功能的需要，而且是有精神功能的。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中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一个建筑群里面也是一样，有中心的建筑、主要建筑，它一定是最高大、最宏伟的，处在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也有附属建筑。皇宫建筑群一定是以皇帝上朝的殿堂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在周边；佛教寺院以如来佛所在的大雄宝殿为中心，周围环绕有观音殿、文殊殿、弥勒殿、天王殿等；道教宫观以玉皇殿或三清殿为中心，周围分布灵官、城隍、关帝、地藏等各路神仙；祠堂建筑以供奉祖宗牌位的正堂为中心；书院建筑以宣教的讲堂为中心；就连老百姓的民居住宅也是以家长居住的正房为中心，儿孙下人们居住的厢房、耳房、后房等分布于前后左右。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建筑群的布局就是社会结构的体现，有主有次，突出中心。

三、城市制度与城市管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完整制度，而且代代延续，只是各朝代有所修改变更而已，说明中国历史上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显得特别突出。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制度的记录，是《考工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王城规划的制度。由于《考工记》是朝廷颁布的官书，因此可以断定中国自古就把城市规划当作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内容之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历朝历代关于城市规划，特别是都城的规划，都是被写入了朝廷政治制度的。

《考工记》中关于王城规划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 1-3-1）文中“国”即诸侯国的王城。意思是：匠人营造的王城为四方形平面，边长九里，每一方向有三座城门；城中有九条纵向道路和九条横向道路，主要道路的宽度是九轨（车子两个轮子之间的宽度为“一轨”）；王宫的左边是祭祖的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会场所，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会场所各占百步见方（边长一百步的正方形为“一夫”）。虽然在后世的城市建设史以及现存的中国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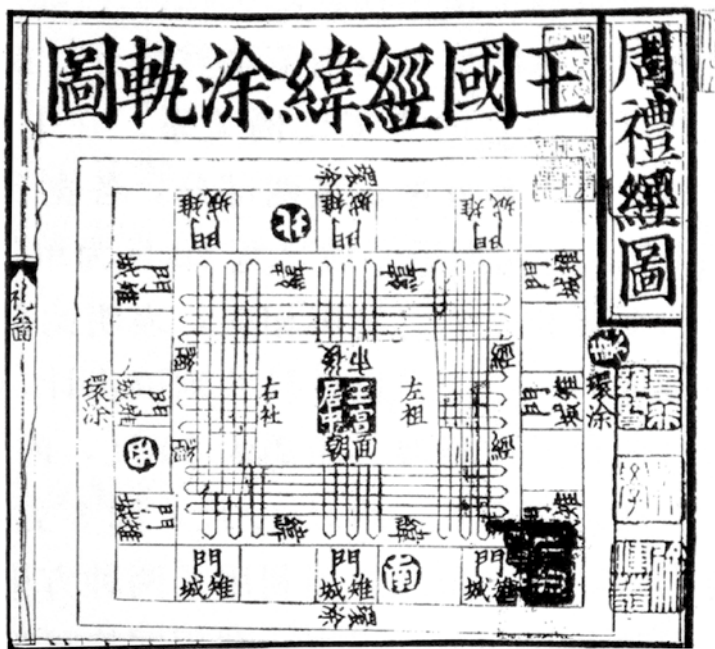


图 1-3-1 《考工记》
“匠人营国”图

城市实例中，完全符合《考工记》中规定的城市规划制度的情况还没有看到，但是受其基本思想影响的情况却比比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九经九纬”；一是“左祖右社”。

《考工记》规定的“九经九纬”制度，在后世城市中并没有几个是真正按此规划的，但是采用纵向、横向道路把城市规整地划分成方格网状，却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最主要的、延续几千年的规划方式，应该说这种规划思想最初主要就来自于《考工记》中“九经九纬”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城市规划的方法和制度叫作“里坊制”。所谓“里坊制”，就是用纵向和横向的道路将整个城市划分成棋盘似的许多小方格，每一个方格就是一个“里”，或者一个“坊”（北魏以前叫“里”，北魏以后叫“坊”），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街区。每个“里”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每面开有一个门，叫“里门”或“坊门”。这种“里坊制”不仅是一种城市规划方式和规划制度，更是一种城市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里坊制就是配合这种政策而制定的一种城市制度。按照里坊制的要求，里坊四周建高墙，不准沿街设商店，城内的居

民只能在规定的区域、规定的时间才能买到东西，这就是“市”。例如唐朝长安城中设有“东市”和“西市”作为买卖交易的场所（图 1-2-4）。即便是有专做买卖的“市”，也不是随时可以买到东西，必须是上午“击鼓”开市到下午“击钲”收市之间才能进行买卖。

里坊的里门“昏而闭，五更而启”，夜晚关闭，不准出入，城中实行宵禁（“夜禁”）。夜晚街上不准人行走，当然也不能买东西。说到“买东西”，这个词语历史上也就是这样来的，唐长安城中有“东市”和“西市”，要买物品必须去那里，久之人们就习惯称“买东西”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那时的城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笔直宽阔的大马路，纵向横向规整严谨；大路两旁是高高的坊墙，没有商店；夜晚人们不能出门，也没有今天的电视，只有早早睡觉，那时的人们真可谓“早睡早起”；夜晚街上实行宵禁，有军队巡逻，遇到有晚上出门犯了“夜禁”的人则抓起来“杖罚”，史书上就有过因犯夜禁而被“杖杀”的记载。正因为有了如此严的制度，城中才会夜不闭户、盗贼不兴，社会治安极好。这就是当时的城市面貌，可见这种城市规划也是首先从社会政治管理方面出发的。

里坊制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到唐朝达到顶峰，从唐朝中后期开始衰亡，到宋朝宋仁宗庆历年间被正式取消了（参见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里坊制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依靠的是市场，而像里坊制那样沿街不准开商店、夜晚不准人上街的制度显然是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事实上，里坊制本来就是为了抑制商业发展而制定的一种城市制度，然而人们慢慢地意识到了商业的逐渐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对生活的改善，便有了打破里坊制、改变城市生活状况的需要，政治上的管制最终抵挡不住经济上的诱惑。到了唐朝中晚期，政治逐渐衰弱，管理也逐渐松懈。虽然仍然有法令禁止，但是打破里坊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史书记载，长安城中有些里坊的坊门开闭不守规矩，有的清晨更鼓尚未响时就已经开了，有的夜已深了还未关闭；里坊内不准开商店的规矩也被打破，据史书记载，有一些里坊内开设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到了唐朝后期，更有“侵街”的现象出现。所谓“侵街”，就是里坊内的民居店铺打破坊墙，突出到墙外的街道边，甚至朝向街道开商店。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虽然总的来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但是仅就商业而言，宋朝的繁荣程度已远远超过唐朝。最初，宋朝统治者还是想延续传统的里坊制，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商业发展的要求。宋初曾经就有“侵街”问题引发了社会的矛盾，统治者要维持封闭的里坊制坊墙，而城市居民则要求打破坊墙朝街上开商店。不断激化的矛盾让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到宋徽宗时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以税收的方式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将“侵街”合法化了，可以说这就是延续千年的里坊制的正式取消。过去的坊墙不见了，代之以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客往来于市，街道车水马龙，甚至出现了通宵达旦经营的夜市，城市商业一派繁荣。关于这种城市景象，我们能从一幅著名的古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直观的印象。《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中商业繁荣的景象（图 1-3-2）。

古代的里坊制虽然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消亡了，但是里坊制的影响却长久地存在。在日本，里坊制的影响非常明显。那时的日本全盘学习中国。日本古代最著名的都城——京都和奈良都是按照中国的里坊制规划建造的，尤其是京都（古代叫“平安京”），完全就是模仿唐朝长安城规划而成，甚至连“东市”“西



图 1-3-2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景象

市”，以及城市中的一些道路名称都是模仿唐长安的，例如中轴线南端的道路叫“朱雀大路”，南边的门叫“朱雀门”（图 1-3-3）。现在，尽管里坊制已经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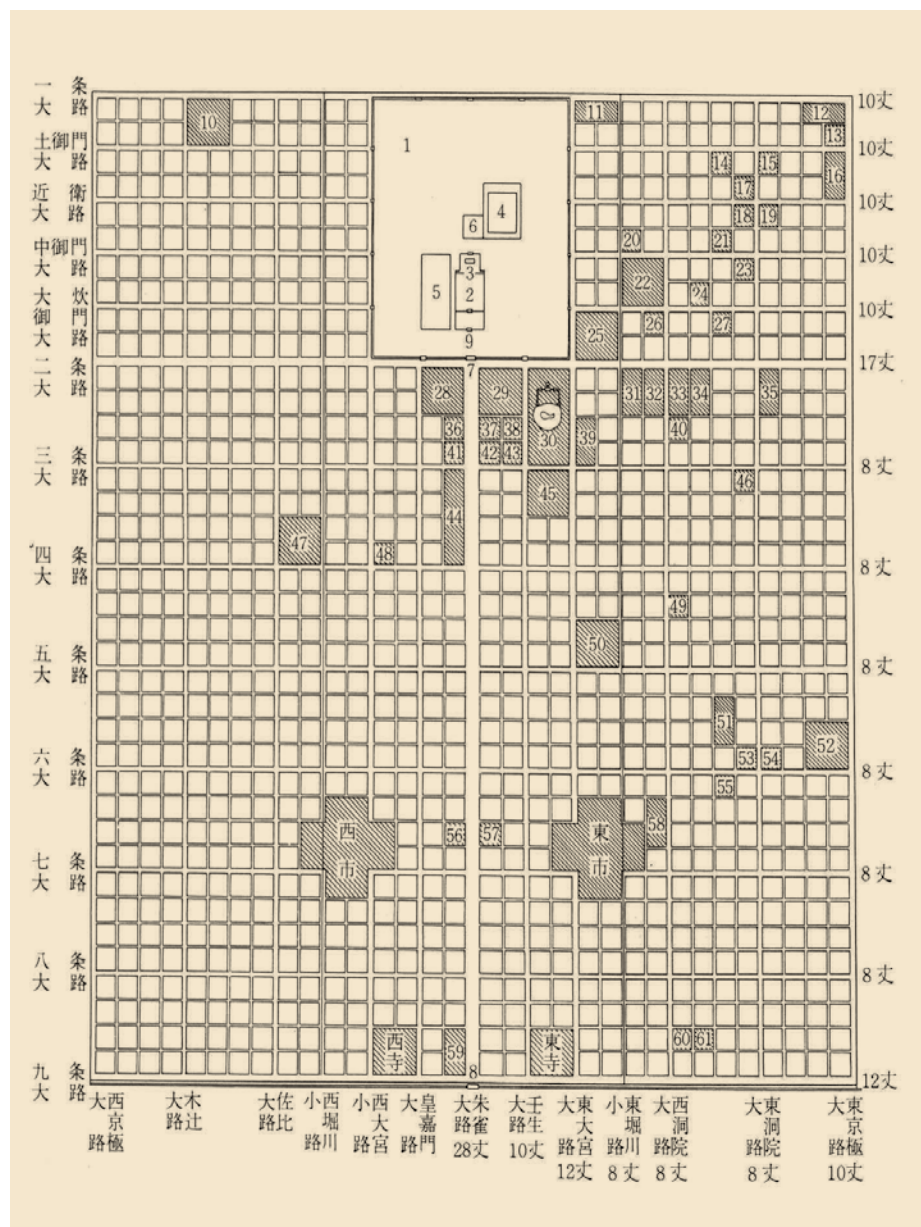


图 1-3-3 日本平安京（京都）平面图

亡多年了，但我们仍能从元大都和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中看到它的影响。虽然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不是严格按照里坊制的方式来规划建造的，但是其城市布局方式却是沿袭里坊制，纵向横向的道路网将城市划分成许多方格形街区。今天北京老城区内的街道和胡同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网格状格局，所不同的只是借用了里坊制的规划方式，而没有沿用里坊制的管理制度。

在民间，里坊作为与人们的居住、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概念，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语言中仍然有许多类似于“邻里”“街坊”“里弄”“坊间”的常用词语，全都来源于“里坊”的观念。另外，在许多传统城市村镇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些里门和坊门，它们显然都是古老的里坊制在人们观念中的遗存(图 1-3-4、图 1-3-5)。在这里，里门或坊门已经没有任何控制人们出入活动的功用，纯粹只是人们出于对自己居住生活的小区域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而建造的一种标志了。



图 1-3-4 湖南长沙九如里里门



图 1-3-5 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坊门

四、历史上的“形象工程”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性因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建筑的形象来表现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以建造宏伟的建筑来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人们谓之“形象工程”，殊不知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这种“形象工程”。

在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商、周、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代，统治阶层中流行建造高台建筑。殷商有鹿台，周代有灵台，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建高台成风，楚国的章华台、魏国的文台、赵国的丛台、韩国的鸿台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台。后来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汉朝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实际上也都是高台建筑，直到东汉曹魏时期还有过著名的铜雀台，此后高台建筑才逐渐减少、消失。

历代统治阶层对建造高台建筑投入如此高的热情，都是为了一点——用以夸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以至于互相攀比、推波助澜之风大盛。汉朝张衡的《东京赋》中说：“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互相攀比竞相建筑高台的事例比比皆是。酈道元《水经注》中记载了楚国章华台的情景：“水东入离湖……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水经注·沔水》）东汉文学家边让在《章华赋》中写道：“穷土木之技，殫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举国家之财力、物力营建高台，穷极豪奢。

《说苑》中记载：“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说苑·佚文辑》）可见其劳民伤财，极尽奢靡，还不准人提意见。

《韩诗外传》中记载：“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有台若此者乎？’”（《韩诗外传·卷八》）楚王建造了极其宏伟华丽的九重之台，邀请齐景公的使者登台观赏，还以挑衅的口气问：“齐国有像这样的台吗？”

春秋战国是建造高台建筑的一个高峰，到秦汉时期，逐渐以大型宫殿建筑群取代单独的高台，但是这时期的宫殿建筑也还是建在高台之上的。秦都咸阳的大量宫殿建筑群之间都有“阁道”相连。所谓“阁道”就是高架于空中的走廊，宫殿与宫殿之间用阁道连接起来，说明这些宫殿都是建在高高的台基之上的。

中国古代建造“形象工程”的第一人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在征讨六国的战争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咸阳城中宫殿之多难以计数。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项羽攻入咸阳，放火烧毁秦皇宫，大火三月不灭，足见其宫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

除了咸阳都城中的宫殿以外，周边地区也大兴土木，建造离宫。从史书中能看到的建于咸阳周边的秦朝离宫就有兴乐宫、信宫、章台宫、上林苑、兰池宫、望夷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蕲年宫等。关外还有很多离宫则难以考证，因为有些外地的离宫名不见经传，最远的建在了渤海之滨。

秦始皇的“形象工程”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三大工程——阿房宫、骊山陵和长城。阿房宫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豪华到什么程度？今天已无从考证。由于史书记载并不详细，仅从人们的口头传说和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来看，阿房宫是一座空前宏伟、举世无双的宫殿建筑群。相传秦朝末年项羽攻进咸阳时放火将其烧毁，然而时至今日，在阿房宫遗址上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完全没有焚烧的痕迹，证明这里根本没有被烧过。从考古的事实推论，直到秦朝灭亡的时候阿房宫还没有建成。现在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的只有阿房宫前殿，这仅仅是阿房宫中的一座殿堂，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阿房宫前殿的规模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考古结果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现存阿房宫遗址内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残高仍有8米左右，经探测实际长度为1320米，宽420米。这大概就是《史记》中所说的“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骊山陵是秦始皇的陵墓，陵墓主体是一个三层方形夯土台，东西宽345米，南北长350米，现存残高87米。它有内外两层围墙环绕，内墙长2.5公里，外垣长6.3公里，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陵墓。秦始皇陵内部的情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用了70多万刑徒，干了10年才得以建成，其工程之浩大，内部之奢侈程度，让人们浮想联翩。今天，我们为了保护的需要而没有发掘它，所以不能确切地知道陵墓内部的情况。但司马迁《史记》中也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内部情况的记述：“始

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槨，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陵墓地宫顶部做成半球形穹隆，镶嵌珠宝，像日月星辰；地面开挖沟渠，灌注水银，像江河大地。用东海鱼油点长明灯。所有这些做法无非就是一种象征，即秦始皇是天地之间永久的统治者。秦陵内的情形是否真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近年来考古学界用科学仪器对秦陵封土堆进行探测，发现封土堆中汞（水银）的含量高于周边土壤中几百倍，证明陵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此外，另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轰动世界、被称为“世界古代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还只是陵墓的陪葬坑，按一般道理，陵墓主体中一定有比陪葬坑更加壮观的场面。

秦始皇三大工程中的另一项，就是著名的长城。长城之宏伟、建造工程之浩大，已经是人尽皆知，无须更多描述。仅就它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就已经是一个历史奇迹。长城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始终被人感叹，被文学作品所描绘。著名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被人们熟知，可事实上“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跟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甚至连孟姜女本人都不是秦朝的人。史籍中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版本众多，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由来都各不相同。但是因为秦始皇修长城工程过于浩大，劳民伤财，使人民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历代人民就借“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来表达对统治者的怨恨。

秦王朝维持的时间不长，从公元前 221 年统一六国，到公元前 209 年灭亡，仅有 13 年。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能够灭六国，统一天下，然而仅维持了十多年的统治。其中原因与不顾国力民力大兴土木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秦朝是因为“建筑”而亡国的。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的任何一项工程都是宏大无比，动辄几十万人，耗费十几年、几十年的工夫。秦朝没有户籍记载，到了繁荣的汉武帝时代，根据户口统计是全国两千万人，秦朝大约与此相当。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要好几个人才能供养起一个不生产的人。全国总人口才两千万人，一项工程就动用几十万人，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要养着。国家和人民怎么负担得起？怎么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所以当陈胜、吴广起义一爆发，全国各地群起响应，空前强大的秦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

秦朝因建筑而亡国了，而紧接着的汉朝却又有一段关于建筑的故事耐人寻味……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但是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首领，互相征战、兼并，最后由刘邦夺得天下，建立了汉朝。这时国家已经是极度贫困，民不聊生。有史书描述当时国家的穷困状态，朝廷官吏出巡甚至连马车都没有，只能坐牛车。汉高祖刘邦来自底层，深知民间疾苦，约法三章，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刘邦亲率军队四处征战，平定天下，委托他的谋士萧何在长安建设都城。《汉书·高帝纪》中记载：“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无）以重威，且亡（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悦），自栌阳徙都长安。”刘邦在外征战，回到长安看到萧何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责问他为何“治宫室过度”，而萧何关于“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之（无）以重威”的回答令刘邦无言以对，并且很高兴地接受了建议。于是就在秦朝亡国后不久，汉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只是稍有收敛，没有了秦朝那样过度的奢华。汉朝宫殿之壮丽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建章宫等。皇宫中还建有园林，未央宫有沧池，建章宫有太液池。著名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围墙周长四百多里，苑内放养野生动物，开挖昆明池，长四十里。从出土的汉朝宫殿建筑的瓦当尺寸就可以想象当年殿宇之宏伟，所谓“秦砖汉瓦”，确实名不虚传（图 1-4-1）。



图 1-4-1 汉朝“长乐未央”瓦当（左）与现在琉璃瓦当（右）的比较

虽然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亡国的教训而有志于节俭，但是萧何的名言“非壮丽无以重威”却明确地道出了国家建筑形象的政治意义，令人无法抗拒。自此，这一观点也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穷尽财力建造宏伟宫殿建筑的思想基础。而且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所谓的“形象工程”。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建造豪华办公楼，并不是实际使用功能上的需要，实际上仍然是为了表达“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

五、礼仪制度与建筑礼制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最集中的体现是等级礼制。礼制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礼制绝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礼”也绝不只是我们平常说的“文明礼貌”，而是贯穿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一种行为规范。“礼”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礼仪交往、文化教育、艺术审美、家族关系，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所有细节方面。中国古代强调以礼治国，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社会规范都按照“礼”的原则来制定，所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

以礼治国的思想原则是周朝确定的，周朝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叫《周礼》。《周礼》是统一国家的时代符合中国宗法家长制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的一种治国方式，然而在春秋战国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周礼》显然不合时宜，于是各诸侯国都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治国的思想和制度。当时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形成了很多哲学流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诸子百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本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哪一种思想来治理国家。大家都希望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而提倡谦虚礼让的《周礼》和符合于《周礼》精神的儒家当然不被人们重视，周朝以来形成的以礼治国的局面，至此已经是“礼崩乐坏”，一片混乱。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为了恢复《周礼》而奔走呼号，却处处碰壁，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秦朝统一天下后，仍然没有恢复《周礼》，这是